



受访者供图

人只是到诊室一次,医生如果不关心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何去何从。”

2011年10月,在许琳即将离开波士顿时,坐火车到玛丽亚家作客。在这栋20年的老房子里,1楼与2楼的天棚上,安装了滑轨系统,从客厅到厨房,从浴室到卧室,没有死角。常年负重让玛丽亚的后背受了伤,她不再有力气托起自己的孩子,她使用一个大型网袋悬挂在滑轨上,这样孩子就可以在一个平移的摇篮里,到达家里任何一个地方。

米尔的床头柜有2层抽屉,每格都放了不同的衣服,标记着周一到周日穿什么衣服,米尔并没有社交,但妈妈依旧给她打扮,如果妈妈不在家,看护米尔的人可以参照标记给米尔换衣服。

米尔和弟弟的骨灰盒,静静地安放在玛丽亚的卧室,玛丽亚说,“可惜再也没有办法为米尔找到像弟弟罗伯特那么小的骨灰盒了,出去的时候不方便带着米尔。”

许琳惊讶地问:“你们外出的时候都带着弟弟的骨灰吗?”

“是的。”

“你们出去买东西、去公园、和亲友聚会的时候也带着它吗?”

“带着。”

“那我第一次在诊室里看到你和米尔的时候,你也带着它吗?”

“是的,我带着。”

许琳想起了米尔的轮椅后方挂着的两个大大的包。

“那我去麻省总医院的病房看米尔的时候,你也带着罗伯特的骨灰吗,我怎么没看到?”

“我把他放到了窗帘的后面,我们永远在一起。”

暮色中,夕阳在棕色的木质上投影出淡淡的光泽,照片里两个孩子无忧无虑地笑。“如果你不走入病人的家庭,如果你不走入病人的心灵,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变故,带着怎样的悲怆情怀。”许琳说。

“当你发现病人并没有按你的建议进行规范的治疗,而是缩减或放弃,请你理解,他并不是想挑战你的权威,可能口袋里都没有今天的饭钱。如果医务人员也抛弃他,他的人生就再无退路。”

“有位名人曾说过,书相当于

是你生产的一个孩子,但写书不如生孩子,生孩子很多人会送红包给你,写书的话,很多人会说能不能给我一本。”这句话逗得记者哈哈大笑。许琳拿出了书,驾轻就熟地翻到了她接触过的一个个人物。

她淡淡地说:“当时提出要写书,我想很多人以为我疯了。我却乐在其中,一口气采访了上百个故事,由于还要上班、写论文,同时做采访和整理,时间严重不够用,有一个礼拜我5天只睡了10个小时,第二个礼拜4天就睡了2个小时。在采写过程中,我不仅了解了医院外病人的真实世界,还因此结识了很多医学界的老师。从他们身上,我深深地感到了他们对人类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身上散发着仁慈。有好几次,采访完,我需要静静地平复情绪半小时才能回去。”

有一次,许琳离开纳贾高波·文纳教授的办公室,她仍感觉被对方身上散发出的安宁温暖的和煦之光照耀着。无论在哪个国家,对医学生很重要的一堂课,就是应该知道什么是贫穷。

在美国的医院里,许琳看到很多病人是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病人的经济条件、穿着大多比较优越,在美国,能读医科的学生,家庭条件一般也很不错,如果没有参加

过太多的志愿者活动,接触过贫穷的人,那么,他对这个世界和人累的认识就不会不全面。在中国,到最好的城市去读最好的医学院、留在最好的医院,是大多数医学生的追求和选择。在医院正式工作后,开始有一些下乡、支援活动,但在医学生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初步形成的时期,学校却往往介入得太少。

许琳认为,贫穷和贫穷的衍生物,是医学生在接受培训之初就应该充分了解的一课。了解贫穷,才能有客观、公允的心态。

许琳曾接诊过一位病人,她为他检查视力时,对方脱口而出“朝东”,许琳愣了一下,换算了一下,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恍然大悟。“贫穷的人也要看病,没文化的人也有接受治疗的权利。”

“当你发现给病人进行了常规的表面消毒却不够,因为皮肤上擦出了很多泥球,请你理解,因为他可能从来都没有住过带淋浴的房间,当你发现病人并没有按你的建议进行规范的治疗,而是缩减或放弃,请你理解,他并不是想挑战你的权威,可能口袋里都没有今天的饭钱,他可能不断被世界抛弃,但如果医务人员也遗弃他,他的人生就再无退路。”

“一些病人会抱怨,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但我见到的大部分人却说,我要过好每一天。我觉得很荣幸,能和这些懂得享受当下的人在一起工作。”
“一个好医生应该知道,不仅仅是你在治疗病人,病人也在治愈你。”

在采访中,那些因为疾病或残疾而陷入人生困境的人们都没有轻易地向命运低头,相反,不少人活得多姿多彩。随着采访的深入,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生铺陈在她面前,让她惊叹生命的顽强。

珍妮特·拉比利克是美国麻省盲人委员会长官(也是这家隶属政府的机构105年来首位非裔盲人长官,首任长官是海伦·凯勒)、新英格兰视光学院的荣誉博士(在114年的校史上,第一次由盲人获此荣誉),她是如此出名的一个女性,许琳想去了解她领衔的机构,见到了她,却忘记了前往的初衷。她也是如此平凡的一个女性,不需灯光辨识颜色,不用镜子化妆,但每天都神采奕奕,气质非凡。哪怕许琳晚上12点给她写信,也会立刻收到她的回信。

有一位乳腺癌领域的社工朱莉告诉许琳:“一些病人会抱怨,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但我见到的大部分人却说,虽然不应该是我,但是我要过好每一天。我觉得很荣幸,能和这些懂得享受当下的人在一起工作。他们是病人吗?不,他们也在治愈我。”

这位社工的第二句话同样让许琳震惊不已:“谁规定女人一定要有乳房,你可以重新定义你的美。”朱莉给她看了一位加拿大医生写的一个病人故事:一个女病人由于购买的保险不涵盖整形的费用,她积攒了5年,然后满心欢喜地预约了手术,希望能回归完整。但她消失了一段时间以后,回来告诉医生,她取消了手术。她把衣扣

解开,不再戴文胸,右胸上的瘢痕被精致的文身掩盖,花朵和叶脉蜿蜒向上,跨过肩膀,像被微风吹拂一般垂悬在后背,一种令人震惊的美。她咯咯笑了,说自己遇到了一个艺术家,他们用这笔钱度过了浪漫的蜜月,她的丈夫让她不再怀疑自己的美,她不再需要手术了。

“重要的是,女性如何看待自己?如何让你的伴侣正确看待你?”文化和社会让我们头脑里有这种印象,一个女人应该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幸存者需要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乳腺癌是常见的,瘢痕见证了你所经历过的人生最困难的时期,失去了的头发也能长出来,你还会变漂亮,你要重新定义你的美……”

采访完朱莉后,许琳久久不能平静。

一位确诊感染艾滋病毒长达26年的厨师吉米·布卡罗给许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琳曾见过他三次,凭直觉觉得对方很奇怪,丝毫没有勾起采访的欲望。第四次在某个公益组织里偶然见到,两人面对面坐着大眼瞪小眼,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眼前的这位患者说:“我现在很忙,到各个公益组织参加活动,积极地治疗,体会每一顿食物的美好,今天就是来参加活动等待披萨的,如果不积极参与到解决方案中,就会成为制造麻烦的机器。”最后一句话把许琳震住了,重新打量起这个患者。

“你真的一点不怨吗?为什么?”许琳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哦,因为,对我而言,爱与恨不并行。而且我的伴侣当时并不是故意的。”

“感染了艾滋病毒以后,这段历程,让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活中的所有悲剧,一定可以让人学到些什么,如果什么都没有学到,那才是真正的悲剧……患病后我更加注意自己的饮食,反思身边的亲情友情。”

吉米的出口成章再次震到了许琳。“谢谢你,吉米,谢谢你的分享,你仍旧如同一道阳光,让未感染者思考,汲取营养,让感染者坚强,看到无限生的希望。”

在写书前,许琳对艾滋病患者群体的了解知之甚少,但随着接触的深入,她越来越发现,没有不干净的疾病,只有不干净的思想。

临走前,许琳总结了这样一段话:“疾病给人的糟糕感觉就是,本来一切尽在掌握,按照自己设计而运行的世界却突然失去了控制。当你失去了或大大损失了对情感、财富、健康等等的掌控,要想摆脱内心的那种无力感,试着把注意力一步步聚焦在那些你仍旧可以胜任、可以控制的事上,比如做一顿好吃的饭、养一盆欣欣向荣的花、和一个知己说说话、把衣服洗净熨干……逐渐恢复内心的平静,让健康、感情、事业逐渐痊愈。”

“一个好医生应该知道,不仅仅是你在治疗病人,病人也在治愈你。”

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不渺小的小人物,如果你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大家分享,请与本版联系: qnbxiaorenwu@sohu.com